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

吴元梁

坚决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战略指导思想，给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一系列的研究课题，推动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就是很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本文想就此谈点陋见，抛砖引玉。

一、社会和谐与社会发展

动物的生命活动利用的是自然界提供的现成资料，它们只是适应着自然环境，接受着环境的自然选择。但是，对于人来说，如果仅仅停留在利用自然界提供的现成资料、停留于适应自然环境，那末人只能过一种和其他动物相差无几的生活，人要想自己的生活超越其他动物，就必须在利用和适应自然界的同时，改造自然界，把自然界改造为适合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化自然，要利用自然界提供的能源和资源创造出可供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志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身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①这就是说，人的生产活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生产、人自身的生产）的实践性质决定了人的类的、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人的存在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存在。人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马克思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②

社会是在人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但形成了的社会则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的活动、生存和发展。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存在着反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又对经济基础存在着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时，生产力就会得到迅速、顺利的发展；当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适合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性质时，经济基础就会得到巩固和完善，适合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本身也能得到巩固和完善。而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转变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会来临。

所谓社会革命就会来临，是说，这时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不能靠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微调、改良、改革来解决，在原来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旧框框、旧制度中，生产力再也不能发展了，不仅被统治阶级无法生存下去，就是统治阶级也无法统治下去了，社会状态也从和谐、有序、稳定、平衡变为混乱、动荡、无序，这时的社会矛盾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革命就是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兴社会力量使用暴力和非暴力的手段从原来的统治阶级手中夺取政权，摧毁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旧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建立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随着新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建立，社会在整体上也就发展为新的社会形态。

通过社会革命而建立的新的社会形态处于新的量变状态。这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之间，并不是不存在矛盾了，而是说，这时候的矛盾也处在量变的阶段，可以通过对生产关系、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进行微调、改革、改良来解决。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表现的不同的人们、群体、集团、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也是如此，虽然矛盾存在着，但社会生活还处在和谐、有序、稳定、平衡的状态之中，社会系统还处于有机运行的状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唯物史观的理论中，社会发展实际上包含着两种意义上的发展：一种是社会形态根本变革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是通过革命实现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飞跃，我们过去在革命年代用唯物史观谈论的社会发展就指的这种社会发展，就是要进行革命。我们现在讲的发展，则是在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质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是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生产经济上的发展，政治文化等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全面进步，也就是人们在生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这种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解放。上述两种发展是互为前提、互相转化的。社会形态量变过程中的发展是社会形态质变时发展的必要准备、必经阶段，而社会形态质变时的发展又是社会形态量变过程中的发展的必然结果。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量变和质变的合乎规律地互相转化的过程。任何事物量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质变之后在新质的基础上又会开始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事物就实现着由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社会和谐与上述两种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前面已经说了，革命时代来临的时候，也就是社会状态从和谐、有序、稳定、平衡变为混乱、动荡、无序，这时候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已进入了激烈的对抗阶段，这时候统治阶级强调要维护原有的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序、平衡，就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被统治阶级则要求打破原有的和谐、有序、稳定、平衡，用革命的手段夺得政权。所以，革命性的社会发展是以原来社会的和谐、有序、稳定、平衡的冲破为前提的。在革命的年代，鼓吹维护原有的和谐、有序、稳定、平衡，只能有利于统治阶级，只能起着阻碍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就说过“……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

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③但是，社会和谐对于社会形态量变时期的社会发展来说，就显示出了另一种关系了。社会革命的胜利和新社会形态的建立，只是扫除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解放了生产力，生产力的真正发展还要靠人们的辛勤劳动，靠人们建设。这时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平衡、有序的社会系统运行状态就是人们从事生产、劳动、实践，发展生产力，进行各种建设的不可缺少的社会条件。

历史上每次革命所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是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得到大发展的。革命中夺得政权的新统治阶级只有实行有利于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的方针、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将建设新社会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反之，如果新统治阶级实行不当的政策，那末革命破坏旧制度所开创的解放局面不仅不会自发地转变成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且还会使社会长期处在动荡、混乱之中，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社会的全面繁荣和进步只能化为泡影，严重的时候还使得革命成果得而复失，出现了旧统治阶级和旧制度的复辟。这种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不仅存在于封建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的历史过程之中，存在于资产阶级取代封建主阶级的历史过程之中，也存在于工人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历史过程之中，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反复表明了社会和谐对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邓小平才一次又一次地谈论稳定的政治环境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极端重要性。1980年1月，他指出，“没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④。1987年3月他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⑤。1989年2月他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⑥。江泽民也反复谈论稳定的重要性、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重要性。1990年9月他说，“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混乱当中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惟有稳定才能搞好经济建设。国泰和民安是紧密相连的，没有国泰就没有民安；没有人民的安居乐业，也没有国家的兴旺发达。”^⑦1997年9月他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⑧近2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成绩，原因之一就是拥有一个和谐、稳定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

二、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已如上述。那么，社会发展对社会和谐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世界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表明，社会发展对社会和谐产生着强烈的、巨大的直接的影响。

现代化过程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变的过程，就是实现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的过程，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又开始了信息化的过程，被学者们称为后工业化、信息化、后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等等。在世界历史上，现代化过程发端于欧洲中世纪末期，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扩大，这又导致了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发展并逐步演变为早期的资产阶级，但是现代化过程的真正大规模地进行，还是在资产阶级经过革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并逐步形成了被当代学者称之为以单纯经济增长为特征的传统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坛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系统统破坏了。它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制造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和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即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它创造了同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哥德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同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完全异趣的远征。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它使原先的不同地区结合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制、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统一的税关的民族。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称作“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⑩。

但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自由竞争式的发展也日益暴露出了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其造成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随着这三大矛盾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以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为内容的社会和谐就逐渐被周期性地爆发的经济危机所破坏。于是就兴起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工人阶级开始了罢工、游行、请愿甚至起义，相继发生了英国宪章运动，法国巴黎工人起义、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在总结工人运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1871年又发生了巴黎工人起义并成立了巴黎公社。虽然巴黎公社在反动派的镇压下失败了，但工人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指导下，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为下一步的斗争进行着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资产阶级也总结了原始资本积累和自由竞争发展模式所存在的问题，许多企业走上了兼并和垄断，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某些问题，资本主义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状态相对和谐的时期。但是，垄断并没有消灭竞争，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世界范围内争夺资源和殖民地的竞争越演越烈，最后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不用说，国内的和谐，就是世界上的和谐也被破坏了。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再度兴起，世界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1917年，在列宁领导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工农兵政权，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探索。列宁时期，先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改为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时期，停止了新经济政策，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工业化运动，逐渐形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生产资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靠剥夺农民的途径积累工业化的资金。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模式既有它形成的历史合理性，也在当时显示了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自由竞争模式的优越性，使苏联在不长的时间内打下了一个工业化的基础，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这种模式的弊端和问题也就逐步暴露了出来。计划脱离实际、价格机制被扭曲，供不应求，计划经济成了短缺经济；中央高度集权体制所造成的人身行政依附关系又束缚压抑了人们的自由和积极性，这种模式逐渐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无力应对经过30年代改革后的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挑战。苏联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开始摸索改革，但到90年代初，苏共几代领导人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改革和发展的道路，结果是社会失控、动荡、混乱，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共和东欧各国党纷纷下台。俄国接着又实行了西方谋士提出的休克疗法，试图一夜之间就实现私有化和市场化，结果造成社会、经济、金融秩序的大混乱，卢布贬值，少数人暴富，大多数人的生活顷刻之间一落千丈，俄国也失去了当年苏联所居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的地位，社会和谐也就无从谈起。剧变后的东欧诸国走上了西方国家的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的发展道路，大量外资进入并主导了经济的发展。匈牙利是这些国家中经济状况最好的一个，但这个外资主导型国家的经济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怪圈：经济持续增长，外贸连年创新高，而与此同时，国家财政却入不敷出、债台高筑、大量失业。去年在大选中获胜并实现连续执政的政府背弃选前对选民的承诺，变减税为大幅度增税，一时间，民怨沸腾，直至酿成骚乱。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评估指出，如果目前这种形势继续下去的话，东欧问题的彻底暴发“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

拉美的主要国家如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等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发展状况也是很说明问题的。据有关专家研究，这些国家的GDP的增长率，50-60年代为5.1%，60-70年代为5.9%，70-80年代为4.5%，它们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间大体上都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1999年，除秘鲁（2130美元）外，其余六国都超过了3000美元。从上世纪80年代起，按照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范式，拉美地区进行了20多年的改革。在自由贸易的旗号下，大力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体系和利率的自由化，方便外来投资，降低公共开支特别是用作社会福利的公共开支，严格履行对外债的偿还承诺，对政府进行重组和现代化改造。整个80年代，拉美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基础之上。拉美在整个90年代的私有化收入占所有不发达国家私有化收入的56%，这说明，拉美是新兴市场地区中私有化和国际化比例最高的地区。虽有大量外资的流入，但GDP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GDP年增长率，80-90年代为1.2%，90-2000年为3.3%，2001年为0.4%，2002年为-0.5%，2003年为1.9%。但是城市公开失业率却一路攀升，1950年为3.4%，1970年为3.8%，1980年为3.9%，1990年为5.7%，1995年为8.7%，2000年为10.2%，2004年为10.0%。标志社会分配公正程度的基尼系数从1970年前后到2002年长期居高不下，以2002年来说，阿根廷为0.59，巴西为0.64，智利为0.55，哥伦比亚为0.575，墨西哥为0.514，秘鲁为0.525，委内瑞拉为0.50，这说明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十分严重，在拉美许多国家，人均收入最高的10%人口拥有的财富是人均收入最低的40%人口的20倍还多。总之，拉美在经济上逐渐形成了对国外的依赖，支柱产业得不到发展，无休止的外债压力，经济停滞，成为一个贫穷、失业、社会成员贫富差别急剧两极分化的地区。社会少数人的财富持续增加和大多数人处于负债和无望境地的社会经济状况，正是拉美发展模式的结果，这种状况的存在和发展也使这些国家的社会极不稳定，有的国家的总统被平民暴乱所推翻，有的国家的政府不断更迭，有的国家发生民众抗议，委内瑞拉则发生了玻利瓦尔革命^[1]。

上述情况表明，不同的发展观念、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对社会整体的存在状况、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产生着不同的影响。而脱离本国本地实际情况或在发展过程中不能根据本国本地实际情况正确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往往不能实现持续发展，或者即使实现了一时的发展，但却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激化了社会矛盾，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科学发展观揭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道路

正是由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的辩证关系，正是由于不同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会形成不同的发展道路，会对社会和谐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马克思主义从其产生的一天起，虽然也重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一个包括和谐社会在内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但更重视通过对现实社会矛盾的研究去揭示从现实社会通向未来社会的现实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与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区别的根本所在。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用毕生的精力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在哲学上创立以唯物史观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经济学上创立剩余价值理论，都是为了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条现实道路。我们党之所以坚持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革命年代就是为了找到一条能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革命道路，新中国建立后，则是为了找到一条能在中国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起初，我们是在苏联创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框架中进行建设并探索我国工业化道路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问题和弊端暴露出来之后，我们又通过改革开放的探索，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针对新世纪新阶段所遇到的矛盾、问题和挑战，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的战略指导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和谐社会只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要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坚持和实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这种对和谐社会的理解实际上又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推向了遥远的未来。按照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社会形态是历史的、具体的，和谐社会或社会和谐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各种社会形态都存在着与其相适应的社会和谐与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也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那种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我们对它如果只是机械地套用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关于姓社姓资的分析标准，那就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只有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通过分析和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才能建设这种社会主义以及和这种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和谐社会。至于外国的这个模式，那个主义，只要能够解决我们问题的，都可以参考和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因此，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它们两个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和规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今后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所论述和规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今后的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述和规定的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今后的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和发展目标互为前提、互相依赖，内在地统一。所以，在现阶段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决贯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只有科学发展观才真正揭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道路。

首先，只有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才能实现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才能不断夯实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人要维持自身的生命，就要生活，就需要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人要劳动，就要有一定的劳动资料。没有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人就面临着生存危机的威胁。但人作为一种有意识的能动的生命有机体，在自己的生命、生存危机的威胁面前，不会消极无为、束手待毙，而会奋起抗争，挑战威胁，排除障碍，创造和开辟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作为社会性的生命有机体，人与人还结合为群体、结合为社会，运用群体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同外部环境抗争。当威胁来自自然界的时候，人们会团结起来，与自然界作斗争；当威胁来自社会内部的时候，受到威胁的人们就会起来同造成威胁的人们进行斗争。一个社会，当大多数人在少数人的统治剥削下，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大多数人就会起来斗争和造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就会荡然无存。阶级社会中的奴隶暴动、农民起义、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如此，这就是“官逼民反”。一个社会要稳定、和谐，最起码的条件就是要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拥有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条件。看看当今世界，大多数的动乱和动荡都发生在贫穷和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而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则相对地稳定与和谐。这就充分说明了经济发展、物质条件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贫困人口已经大大减少，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普遍得到了改善，但大多数还只是过着一种低水平的小康生活。况且，每年还有大量的新增人口，就业的压力很大。民生问题依然是我们面临首要问题。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只注意经济上的数量增长，不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一味仰仗外延式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基础上的，这样的增长既没有实效也不能持久。我们只有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克服以往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解决它所造成的问题，既保持经济增长的一定的数量和规模，又注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改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使生产的过程成为节约型、清洁型、循环型的过程，实现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协调发展，使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而经济的这种发展就可以不断增强我们用来解决民生问题的条件和力量，从而巩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其次，只有坚决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关系，积极推进社会建设，更加重视社会公正，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一个越来越好的社会环境。前面我们谈到了经济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但经济发展还只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建设和谐社会还要有一些充分条件，社会公正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条件。经济发展了，如果社会反而变得更不公正了，那社会就不是走向和谐，而是走向动荡。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表明，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千美元之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这既是一个进一步发展的机遇期，也

是一个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多发期，处理好就可以继续加速经济社会的发展，处理不好就会使社会陷入动荡和混乱。而在众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中，许多是由于前一时期中所积累起来的社会不公正所引起的。所以，社会公正问题就成为能不能利用前期发展成果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我们党在我国发展进入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后及时地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我们更好地处理好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效率和公正之间的关系，缩小由于分配不公所造成的社会不同阶层在拥有财富上的不合理差距，建立健全社会救济、社会慈善、社会公益、社会保障事业，使社会低收入阶层及各种危难弱势群体也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并且逐步使拥有社会财富不等的社会各阶层在社会总人口的比例结构由以往的那种金字塔型结构改变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即中等收入的社会阶层的人数最多的社会结构。国际上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表明，具有这种结构的社会一般都比较稳定，可以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一个较好的社会环境。再次，只有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真正改变过去曾经存在过的那种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把文化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在加强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认真注意建设和谐文化，就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必要的文化条件。和谐社会这个概念不仅包含着经济内涵，还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一个和谐社会不仅要求建立人们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协调和谐的关系，还要求人们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形成对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思想舆论导向的认同感，还要求人们在遵循共同的理想、信念、道德规范、核心价值体系、思想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对人们在特定的社会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习惯、兴趣爱好、审美情趣、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上的多样性给予认同和理解。和谐社会在文化上既不能没有统一，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什么都统一。什么都统一了，这个社会就会被统死，那不叫和谐，那叫万马齐喑，和谐社会在文化上应该是和而不同，应该是充满了活力和生机的社会，应该是具有能够孕育和产生文化大师大家的社会文化氛围的社会。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没有和谐文化或文化上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建成。因此，党的16届6中全会决议中所提出的和谐文化概念，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究竟什么叫和谐文化以及怎样建设这种文化并实现文化上的和谐，是值得理论界和党政有关部门认真研究的。

最后，只有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使政治建设真正能随着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发展而发展，真正适应并服务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之间协调发展的要求，为和谐经济、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和谐生态提供一种和谐的政治，为和谐社会建设创造政治及制度上的保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同时，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权利，努力做到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的统一。但是，必须看到，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和我国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曾多次发生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破坏民主法制的情况，这表明这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它同样存在着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形式与实质的矛盾。民主集中制既是党内生活的组织原则，也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组织原则，叫做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理论上看是很好的、很辩证的，但实践起来就不完全象理论上说的那样了，前半句往往是虚的、软的、不确定的；后半句则是实的、硬的、确定的，其结果是使我们的政治制度在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制度，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呈金字塔型，金字塔顶端的权力最大，各级党政干部的任免在名义上、形式上似乎也在征求民意、甚至经过民选，但实际上还是自上而下任命的，我们经常要求干部将对党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对下负责统一起来，但各级干部实际上往往只对党和上级负责，结果是下级对上级、特别是处于金字塔底层的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政各级干部权力的监督、特别是对塔顶权力的监督缺乏制度性的机制；还必须看到，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阶段以来，随着我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又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情况、新要求、新课题。当年老一代共产党人在长征中经历了雪山草地的考验，夺取了革命的胜利，这已经由历史作出了回答；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能不能经历花天酒地的考验，在带领人民群众走向富裕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清正廉洁，这还是有待于新一代共产党人用行动作出回答的问题，加上腐败象肿瘤一样的蔓延，制度性的监督机制又不健全，广大善良的人民群众虽然希望新一代共产党人能够经历考验，作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回答，但心中存在疑虑现象还是很普遍的，要克服人们心头的这种疑虑，恐怕还要靠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制度解决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如何做到既越位又不缺位，市场、政府、社会这三者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各自中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也是政府建设面临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在总体的政治地位上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但就个体而言，他不过是一个打工者。工人农民在总体的政治地位上是我们国家的主人，但他们中为数不少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却沦为弱势群体，这是需要加以正确解决的一种新的矛盾；毋庸讳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劳动、管理、技术各个要素在生产 and 分配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其中特别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有时会变得十分突出和尖锐，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如何协调好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实现劳资两利，也是新问题；以人为本，除了要把人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外，还包含着要把处理好人们之间的种种矛盾作为发展过程的头等大事来对待，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顺了、矛盾处理好了，人们就能够各得其位、各尽其能、各获其利，和谐相处。所以，我们只有不断推进政治建设，做到政通人和，才能实际地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注释：

-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97页
-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 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页
- ④邓小平：《目前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252页
- ⑤邓小平：《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 ⑥邓小平：《压倒一切的是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 ⑦《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页
- ⑧《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 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8—471页
- 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页
- (11) 关于拉美国家的情况，参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编印的有关资料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苏振兴研究员提供的资料。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哲学所 邮政编码：100732